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21世纪
中国生育政策论争

The Debate on
China's Populatio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顾宝昌 李建新/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顾宝昌，李建新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1390-7

Ⅰ.①2… Ⅱ.①顾… ②李… Ⅲ.①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研究-中国-21 世纪 Ⅳ.①C9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8173 号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系列·

21 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

主　　编 / 顾宝昌　李建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5936707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010）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经理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郑　嫣
责任校对 / 马　剑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9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390-7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进入21世纪，围绕着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话题不断。人口学界长期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理应对这段“历史”有个记录，当然这种“记录”难免挂一漏万。关于本书的选文，主编采取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由常年在这一研究领域耕耘的学者自荐和推荐文章，然后，主编者再根据文章的时效性和代表性选取。虽然我们尽可能地“网罗”有分量且有代表性的文章入选，但毋庸置疑，这样的选编，由于有篇幅的限制，也由于有主编者的“立场”和“意志”，不可能不“漏选”优秀之作。

事实上，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实施“一孩”政策以来就充满着争议，可以说，那是我国关于人口问题认识和生育政策的转折点。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包括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规律（包括人口过程和规律）都有了新的认识。以下几个议题始终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关键问题：其一，关于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及人口转变规律的再认识问题；其二，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即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三，如何评估现行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特别是评估生育政策实施的、被人们忽略或淡化的“滞后”后果；其四，公共政策包括人口和生育政策背后应该体现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观。本书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些基本而重要的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收集了几篇对当今我国人口形势，特别是对我国生育水平现状进行研究的文章。顾宝昌的《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是我们了解当前我国人口形势的基础，虽然时隔几年，我国人口、社会经济形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篇2006年的文章仍不失为我们了解我国人口“态势”的重要力作。郭志刚等的《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一方面表明我国政策生

育率不是外界理解的完全“一胎化”政策；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我国政策生育率“多样性”的局限以及生育政策选择空间太小的现实。王丰等的《21 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则强调了被人们忽视的在长期低生育率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人口规律，指出了长期低生育率的人口后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我国 21 世纪的人口形势及问题作出了基本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解决我国复杂人口问题的战略措施和目标。郭志刚的《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则借助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考察了被人们忽略的影响我国当前低生育水平的若干因素，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当前我国生育水平“很低”的真实性。事实上，这也成为不同学者之间或官方论争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时机的一个焦点。

第二部分收集了几篇对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进行评价的文章。翟振武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虽说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时我国人口政策的梳理，但却厘清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我国人口高增长是人口转变规律使然，而非“错批一人”所致，有“正本清源”之效。王金营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评估了在不同假定条件下，我国从 1972 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控制人口数量的成效，肯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抑制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贡献。张二力的《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关注了生育政策对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地市”的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失衡现象与生育政策直接有关，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和女婴死亡率严重偏高的问题。由《人口研究》编辑部委托顾宝昌主持的《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论坛，选取了一组相关文章，总结和评估了不同地区实施二孩政策的效果，反映了八百万人口 20 多年来“二孩”生育政策的成功实践。这些地区“二孩”生育政策的成功不仅仅表现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如降低生育水平，遏制人口快速增长），还表现在人口结构的合理上（如出生性别比平衡、家庭结构稳定），更表现在社会效益上（如干群关系和谐、群众支持拥护等）。实际上，这些“二孩”生育政策实践地区的效果评价是参照现行生育政策进行的，所以这样一个结论也从另一个方面“评价”了当前的现行生育政策。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反思。梁中堂的《现行生育政策研究》道出了现行生育政策的“来龙去脉”。作为那个时代我国生育政策争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梁中堂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反映了那个时代政府与学者对人口问题认识的过程以及误区，为我们认真反思现行生育政策打下了“基础”。陈友华的《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则尝试去回答人们对于调整生育政策的诸多疑问，如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政策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人

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桂世勋的《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从多方面就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同时对调整时间和调整方案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周长洪的《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就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的严重不利影响、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的不利效应，以及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进而论证了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的必要性。李建新的《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针对2007 年发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进行了反思，指出在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上，许多官方观点仍没有彻底摆脱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一孩”政策出台前后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的误区，依然存在着许多主观“建构”人口数量问题危机的现象，而在应对各种不同人口问题的措施上，也未真正体现出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

第四部分收集了多篇对未来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主张和有关人口发展战略的思考。顾宝昌的《七年之旅——中国生育政策研究（2001 ~ 2008）》记录了 21 世纪头近十年我国学者在生育政策研究和积极主张调整生育政策上的努力。可以说，顾宝昌、王丰等学者组织的非官方研究团队以低调求实的精神，一直从不同的方面扎扎实实地开展生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力求得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前两篇的 2004 年的“调整生育政策建议”和 2009 年的“再建议”正是广大人口学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反映了当今人口学界同仁对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集体认同。乔晓春、任强的《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的对比，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结论：为了避免我国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曾毅的《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预测比较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和二孩晚育“软着陆”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社会经济未来变化情况，如城乡老年人口比例、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等变化，论证了生育政策“软着陆”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市场与人口分析》的《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以“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为选题，邀请了若干专家就我国未来生育政策走向进行了探讨，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一篇李建新的《大国人口实力比较下的人口战略选择》以动态的结构视角对 21 世纪最具竞争力的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人口变化进行了考察，并就人口变动趋势对大国未来软硬实力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继续

实施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将不利于我国保持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将无异于“自毁长城”。对于我国人口的长远发展战略，我们需要在世界历史人口特别是大国人口变迁的比较研究中去思考，需要在全球体系大国实力兴衰的替代规律中去把握。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理论与实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人口问题的实质不是人口数量多少带来的问题，而是人口怎样变化带来的问题，是人口规模与结构急剧变化带来的问题。我国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这正是我们高度关注并深入论争生育政策调整的现实意义所在。

最后，需要再重复的是，本书的选编有不少优秀之作的“遗漏”，在此还请诸位同行学者海涵。感谢所有关心我国生育政策和我国人口发展的学者，感谢许静同学对本书收集资料的贡献，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邓泳红女士的支持，感谢本书编辑郑嫣女士的辛勤工作。

顾宝昌　李建新

2010 年 3 月 28 日

目　录

人口发展态势

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 …… 顾宝昌 / 3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 郭志刚　张二力　顾宝昌　王　丰 / 25
21 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 王　丰　郭志刚　茅倬彦 / 40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 54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 郭志刚 / 68

人口生育政策评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 …… 翟振武 / 87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 …… 王金营 / 102
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
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 …… 张二力 / 116
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顾宝昌 / 126

人口生育政策反思

现行生育政策研究 …… 梁中堂 / 153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 陈友华 / 166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 桂世勋 / 185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
——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周长洪 / 193
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 …… 李建新 / 201

未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选择

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21 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 / 215
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
……“21 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 / 220
七年之旅——中国生育政策研究（2001 ~ 2008） …… 顾宝昌 / 230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 乔晓春 任 强 / 238
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曾 毅 / 257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 ……《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 280
大国人口实力比较下的人口战略选择
——人口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 …… 李建新 / 306

人口发展态势

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

顾宝昌*

人口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和认识人口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探索和认识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过程，既是十分艰苦复杂的，又是饶有兴趣的过程。认识和把握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就能在行动中获得主动，否则就会被动。当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但是，面对纷乱复杂的人口现象，认识和把握人口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有助于我们在迷乱中保持清醒，在浮躁中坚持冷静。为此，我把本文关于人口转变过程和形势的讨论立题为“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这里的“新时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2005～2006 年，我们正在从完成“十五”计划到进入“十一五”规划的新的发展时期，进入了一个以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新时期；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口态势已经终结了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阶段，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历史性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　关于人口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以及这种过快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一直是人们对中国人口问题关注的焦点。尽管从 20 世纪末以来，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仍然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 21 世纪初，我们曾

*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经用表 1 来强调，尽管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已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下降了一半以上，到达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尽管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从 1950 年平均一个妇女一生要生育 6 个孩子降低到目前生育不到 2 个孩子；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确是经历了一个从典型的高生育率到典型的低生育率（即在更替水平以下）的变化过程；但是，中国人口的年出生量和年增长量仍很高，与新中国成立初相差无几。因而我们认为，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仍将处于一种“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并存”的局面（顾宝昌，2002）。

表 1　中国人口变动（1950～2000 年）

年　份	出生率(‰)	出生量(万人)	增长率(‰)	增长量(万人)	总和生育率
1950	37.0	2020	20.0	1030	5.81
1971	30.7	2580	23.3	2240	5.44
1982	22.3	2250	15.7	1580	2.87
1990	21.1	2400	14.4	1630	2.31
2000	15.5	1960	8.7	1100	1.80

资料来源：顾宝昌，2002。

但是，这几年的时态发展对这种判断提出了质疑。表 2 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的 2000～2004 年每年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以及出生人数、死亡人数和增长人数。表 2 显示，尽管我国的总人口仍在不断增长，每年的增长量却在不断减少，从 900 多万下降到 700 多万，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在死亡率和死亡人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出生率和出生人数在不断下降，出生率下降了 2 个千分点，出生人数减少了近 200 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6‰以下，在全国各地区中，自然增长率仍在 10‰以上的就剩下西藏（11.2‰）、宁夏（11.18‰）和新疆（10.91‰）。在这种情况下，再说我国人口处于“高增长量”已经难以自圆其说。

表 2　中国人口变动（2000～2004 年）

年　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出生人数（万人）	死亡率（‰）	死亡人数（万人）	自然增长率（‰）	自然增长人数(万人)
2000	126743	14.03	1771.49	6.45	814.41	7.58	957.08
2001	127627	13.38	1701.74	6.43	817.8	6.95	883.94
2002	128453	12.86	1646.59	6.41	820.74	6.45	825.86
2003	129227	12.41	1598.90	6.40	824.58	6.01	774.33
2004	129988	12.29	1592.88	6.42	832.08	5.87	760.80

资料来源：年度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2005b。

我国人口增长趋于缓慢的趋势也可以从人们对达到峰值人口的时间和人口规模的估计中看出迹象。所谓峰值人口，即在人口达到“出生量和死亡量相抵、增长率和增长量为零”的“人口零增长”状态的时间和人口规模。在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我国要到21世纪中叶人口达到16亿时才能实现零增长；到21世纪初，人们转而认为，我国人口在21世纪40年代就会达到零增长，峰值人口为15亿左右；近来，人们纷纷认为，我国在21世纪30年代初就会达到零增长，而届时的中国人口将不到15亿，而可能在14.5亿左右。最近发表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4）估计，中国人口到2030年将达到峰值，峰值人口为14.46亿；届时，印度的人口将达到14.49亿，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United Nations，2005）。

中国并不向来就是一个人口高增长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口一直处于由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抵造成的低增长率的状态。人口出现高增长是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仍保持在高水平的自近代历史以来出现的人口现象（见图1，鲍思顿等，2005）。这种现象符合人口转变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但也预示着，人口高增长只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时的现象。现在看来，“人口高增长”这个在近几百年来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人口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的时刻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也可以从关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讨论，从关于小学不断萎缩、小学生不断减少的众多报告中看出端倪。作为它的一个标志，我国将在今后几十年里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转让给我们的邻邦——印度，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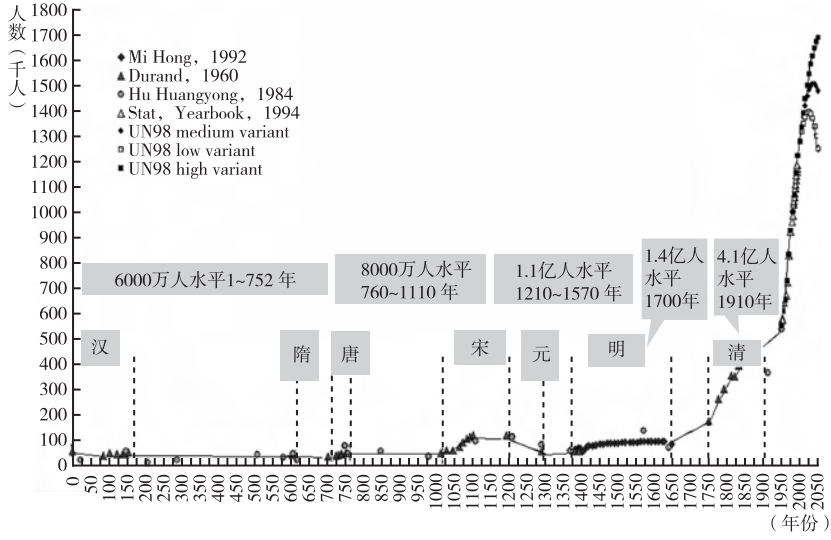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人口增长，1~2050年

二 生育水平

为了客观地测定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人口学家经过了几代的艰苦努力，研究出一个重要的指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不同在于，出生率是以某一时期（如某一年）中的出生数量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的，通常以千分比为标志；而总和生育率是育龄妇女（通常是 15～49 岁）在某一时期（如某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的总和，这样就剔除了由于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增强了这一指标在年龄性别结构不同的人口之间的可比性，而以一个妇女一生的生育孩子数为衡量单位。

在考察生育水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关系中，人口学家特别提出了"更替水平"的概念，即一个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所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一对夫妇要实现下一代对自身的更替，就需要生育 2 个孩子，但由于下一代在出生后还要经过几十年（比如 20 年），才能达到生育的年龄，期间会出现死亡的可能，因而要加上一个死亡的概率（比如 0.1 个孩子），这样，一般把一对夫妇需要生育 2.1 个孩子作为实现人口世代更替的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 2.1。简言之，如果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 2.1 的更替水平以上，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多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如果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 2.1 的更替水平以下，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少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小，出现人口萎缩。因此，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是保持在更替水平（2.1）以上还是以下，就成为考察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①]。

一个时期以来，什么是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成为考察人口形势的争论焦点。2000 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 1.22。这一结果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是"偏低"了。于是，围绕着什么是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出现了众说纷纭、烽烟四起的局面。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都逐年报告了十分详尽的分年龄分性别分孩次的生育情况（见表 3）。尽管这些都是国家的统计权威机构正式发布的官方数据，但这些调查结果显然都被打入了冷宫，而鲜为人们所提及。可是，如果我们不把"统计当会计"，而把统计结果作为"时态发

① 翟振武等（2000）指出，更替水平不是一个固定值，而会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而下降，随着出生性别比的提高而提高。鉴于中国目前过高的出生性别比，中国的人口更替水平应在"2.31 或更高一点"。

展趋势”的反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生育水平的趋势是十分明显和一致的，即中国的生育水平是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左右。尽管人们从各种角度和方法企图寻找什么是我国目前确切的生育水平，并且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即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确实已经达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已经毋庸置疑地进入了一个低生育水平的阶段（乔晓春，2005）。

表3 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2000～2004年）

单位：‰

分年龄生育率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15～19岁	5.96	2.70	2.68	5.25	5.56
20～24岁	114.49	107.70	113.15	122.67	120.85
25～29岁	86.19	115.37	106.09	102.44	107.60
30～34岁	28.62	40.06	42.68	38.28	42.21
35～39岁	6.22	9.22	9.68	8.65	10.14
40～44岁	1.46	1.83	1.88	1.77	1.93
45～49岁	0.68	0.60	0.37	0.56	0.41
TFR	1.22	1.39	1.38	1.40	1.44

资料来源：2000年人口普查；2001～2004年历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总和生育率从其本意来说，应该成为我们观察人口形势的一个敏感指标，我们可以从每年生育水平的变化中看到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就如同我们在经济领域，运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从年度GDP的变化来观察经济形势一样。而总和生育率在年度之间的变动应该是一个难免和正常的现象。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个时期以来，官方认定的生育水平一直坚持在“1.8左右”的口径，这样无形中使总和生育率从“变数”蜕变成了一个“常量”，失去了它作为人口指标的敏感性，也失去了它作为观察生育趋势风向标的效用。

长期以来，“中国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已经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但什么是“低生育水平”？应该稳定在什么“低生育水平”上？人们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比如，有的人认为，“低生育水平”是指全国平均生育水平；也有的人认为，是指当地的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郭志刚等，2003）；等等。但是，以上讨论表明，从人口学的原理来讲，所谓的“低生育水平”应该是以是否达到2.1的更替水平为标志的。联合国人口司长期以来认为，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在降低到更替水平后会基本上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并以此为假设来作出人口预测（United Nations，1997）。但这些年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后，出现了

继续下降的态势，从 2.1 下降到 1.8，又下降到 1.5。因而，从 2000 年起，联合国人口司修正了其观点，在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人口展望》的修订中下调了对世界各国的人口预测。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United Nations，2000；郭志刚，2004）。目前，世界上有 65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43%）的生育水平已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大约有 31 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每个妇女生 1.5 个孩子之下，并且预示着在未来有更多的国家将加入“极低生育水平”的行列。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国家在生育率降到如此之低之后能再把生育率升回到 1.5；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办法，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生育率升回到 2.1 的更替水平。

从中国来讲，不少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生育水平已经多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如果把它们考虑成一个“国家”，也可被纳入世界上最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穆光宗等，2005）。因此，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及时考虑当前的生育水平是否过低的问题。但另一种意见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口规模大，各地差异悬殊，农村人口比重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仍然存在着生育水平上升的可能性。

三　生育行为

人口行为在群体上的变化趋势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态势。但是，任何社会的人口态势都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口行为集合而成的。因此，尽管人口学要回答的是群体上的人口态势问题，仍然不能不关注人口行为在个体上的发生情况。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不管是高是低，作为一个宏观指标，是由千千万万个人的生育行为所决定的。为了把握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我们就不能不考察人们的生育行为的发生情况。关于人们的生育行为，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即，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以及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的关系。

为了了解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关系，近年来已经开展了各种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调查，包括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在 2002 年主持的“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陈胜利、张世琨，2003）。这些调查的调查范围、样本规模、考察重点都不尽相同，但其结果都表明，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不同教育水平之间和不同的子女性别偏好之间，人们所表述的生育意愿仍存在差异，但所谓“多子多福”已经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育意愿，普遍的生育意愿已经降低到 2 个孩子（郑真真，2004；莫丽霞，2005）。

但是，人们在调查中所报告的生育意愿与人们实际会发生的生育行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所报告的生育意愿对人们实际会发生的生育行为有多大的预测

性？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而往往可能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的表现在于，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进入人口转变的初期时，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高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而在一个到达人口转变末期的低生育率的社会中，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对这种“规律性”现象的解释是，在高生育率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由于不能有效地避免自身所不希望的生育行为，即没能避免“非意愿生育”的发生，从而造成了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的结果；而在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由于经济或社会的种种原因的限制而难以实现自身所希望的“理想状态下”的生育意愿，即抑制了“意愿生育”的发生，从而造成了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结果。比如，1960 年代末期泰国的生育率为 6.1，而生育意愿却只有 3.9 个孩子；到 1990 年代初，当实际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到了低于更替水平的 1.9 时，生育意愿却只是小幅度下降到略高于更替水平的 2.4 个孩子（Bongaarts，2001）[①]。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的人口态势中出现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来越相互背离的趋势。比如，上面的泰国的例子表明，在 25 年中，生育意愿只降低了 1.5 个孩子（从 3.9 到 2.4），而实际生育水平却降低了 4.2 个孩子（从 6.1 到 1.9）；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是生育意愿的下降的两倍以上。另外，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中，近年来的调查也表明，人们在调查中所报告的生育意愿非常稳定地保持在 2 个孩子左右的水平，但实际的生育行为却出现了不断下降，甚至急剧下降，达到接近 1 的水平。比如，在韩国，总和生育率从 1986 年的 1.6 不断下降到 2002 年的 1.2，而 1991～2000 年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则相当稳定地保持在 2.2 左右（Choe 等，2004）。这种“生育意愿稳定而生育行为下降”的情况使这些国家的人口学家们困惑不解，也使政府部门措手不及。比如，韩国在 1996 年出台了保持生育率在 1.6 的新人口政策，但生育率仍继续下降到 2004 年的 1.19，于是在 2005 年又提出了要把生育率在 2010 年提升到 1.6 的目标。如果我们认定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低生育水平的阶段，那么，很可能出现的是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状态。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类似经验，应该对我们有借鉴的意义（顾宝昌，2006）。

在中国的环境下，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探索的一个难解之题是由于其中有着生育政策的介入。人们往往以“由于生育政策的存在而使人们对生育意愿的表达不免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来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不一致

① 这种“不一致性”也受到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高低和生育子女的性别偏好的强弱的影响（Bongaarts，2001）。

性。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另一个关于生育政策和生育行为的关系问题，即生育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是，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即一个地方的生育政策越“宽松”，人们的生育行为就越高，导致生育水平的上升。这里隐含着政策主导生育的“政策决定论”的推理。但这种推理是否能在实践中得到印证，还是有争议的。有人以某个地区原来的生育政策较“宽松”而生育水平也较高，后来政策“收紧”生育水平也下来了来支持这种看法。但也有相反的案例。比如，地处西北大漠的甘肃省酒泉地区实行一对夫妇生育 2 个孩子的政策至今已经有 20 年了。尽管政策允许人们可以有 2 个孩子，可是酒泉的生育率从来没有达到 2，而只有 1.6 左右，放弃 2 孩生育的夫妇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出现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政策的情况。2000 年中国人口学会曾组织对酒泉地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考察，结果发现，尽管酒泉的生育政策比全省“宽松”，但它的各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指标都好于全省（见表 4）。这说明，对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并不仅仅是生育政策，并且在生育水平越低的地方，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往往越大。

表 4　1999 年甘肃全省与酒泉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数据比较

项　目	甘肃全省	酒泉地区	项　目	甘肃全省	酒泉地区
人口出生率(‰)	15.61	14	多孩妇女比例(%)	24.05	8.19
人口增长率(‰)	9.17	7.2	妇女综合节育率(%)	88.60	88.2
计划生育率(‰)	85.6	99.99	晚婚率(%)	51.28	64.41
妇女总和生育率	1.9	1.54	多孩率(%)	1.5	0.08
一孩妇女比例(%)	29.18	44.4	早婚比	0.36	0.02
两孩妇女比例(%)	41.12	41.82	计划生育合格村(%)	58.2	95

资料来源：王素银，2000。

四　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的下降就意味着新生人口的减少，也同时意味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越急剧，老年人口的比例也会上升得更快、更急剧。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寿命延长，促使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加剧。尽管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还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近年来，人口老龄化